



徽学文库

主编◎卞利

明清徽州人口 与社会研究

胡中生◎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明清徽州人口 与社会研究

胡中生◎著

激学文库

主编◎卞利 副主编◎胡中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胡中生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4

(徽学文库/卞利主编)

ISBN 978-7-5664-0837-2

I. ①明… II. ①胡… III. ①人口—关系—社会发展—研究—安徽省—明清时代 IV. ①C924.2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7818 号

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

Mingqing Huizhou Renkou yu Shehui Yanjiu

胡中生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2.75
字 数: 334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定 价: 58.00元

ISBN 978-7-5664-0837-2

策划编辑: 饶涛 鲍家全 张锐
责任编辑: 张锐 胡心怡
责任印制: 陈如

装帧设计: 张浩 李军
美术编辑: 李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总 序

尽管“徽学”一词出现的时间较早,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术和学科研究领域,“徽学”则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1932年,徽州乡贤、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黄宾虹在致徽州乡土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许承尧的一封信函中第一次提出了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徽学”概念。^①

客观地说,黄宾虹所说的“徽学”及其研究对象,实际上还仅仅指的是徽州的地方史研究,与我们今天所称的“徽学”,在学术内涵上还有一定的差别。此后,随着富有典型特征的徽州庄仆制、徽商和徽州宗族与族谱研究的不断深入,真正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上的“徽学”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正如徽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创始者傅衣凌先生在总结自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徽州庄仆制和徽商的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徽州的研究并不是立足于对徽州地方史的探讨,而是通过对徽州伴当和世仆的研究,探索中国的奴隶制度史;对徽商的研究,则是基于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也就是说,徽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体现为,其在充实和完善中国奴隶制度史、中国经济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领域,已经远远突破了徽州地方史的界限,而成为整体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傅衣凌先生

^① 卢辅圣、曹锦炎主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与许承尧》,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敏锐地预见到,“徽州研究正形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活跃在我国的史学论坛之上”^①。

然而,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和学科专门研究领域,徽学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主要还是借助于近百万件自宋至民国时期徽州原始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徽州的契约文书自1946年4月在南京首次被学者发现以来,至今已逾半个世纪。随着徽州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的展开以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深藏于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原徽州(府)六县民间的各类原始契约文书开始被大规模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徽州原始契约文书包括卖身契、土地买卖与租佃契约、分家阉书、鱼鳞图册、赋役黄册、诉讼案卷、科举教育文书、置产簿、誉契簿、徽商账簿和日记杂钞等类型,且上起南宋,下迄民国,时间跨度近千年之久,总量约有100万件(册)之巨。

同祖国其他地域相继发现的原始契约文书相比,徽州契约文书具有真实性、连续性、具体性、典型性、启发性和民间性等诸多特征,而且内容丰富,类型广泛,蕴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进行宋元明清时期各种制度运行特别是明清时期历史社会实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知道,敦煌文书的时间下限在北宋,徽州契约文书的上限则在南宋,正好与敦煌文书相连。如果我们把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中的动产与不动产买卖和租佃文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部中国古代动产和不动产买卖与租佃制度及其运行史便可以完整地复原和再现出来。

正是由于徽州契约文书蕴含着如此珍贵的历史信息和丰厚的学术内涵,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78年以后,海内外学者纷纷到北京和安徽,查阅徽州契约文书,深入契约文书的发现地——徽州,进行田野调查。英国著名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对徽州原始契约文书进行全面调查后,撰文指出,徽州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

^① 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傅衣凌序》,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

④ 周绍泉:《从甲骨文说到雍正朱批》,载《北京日报》,1999年3月24日。

字之学”。他紧接着论及了殷墟甲骨文、敦煌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发现,认为:“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当会产生新的学科。^①如今,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学早已创立了各自的学科研究体系,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和认可。而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形成较晚,它的创立,首先得力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徽州近100万件(册)原始契约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9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现存1万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更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徽学这座大厦坚实的学术支撑。因此,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整体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徽州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正是建立在包括徽州契约文书在内的大量新资料发现这一基础之上的。通过对徽州文书、其他相关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研究者得以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重新检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轨迹,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特征和规律。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批准设立,徽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徽学基础研究、资料整理、人才培养、咨询服务的唯一一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一向重视徽学前沿领域的探讨和研究,致力于徽州文书和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致力于徽学学科的建设 and 人才队伍培养,致力于海内外徽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徽州契约文书和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与出版的全面展开,徽学理论与学科建设的有序进行,徽学专题研究成果的次第推出,特别是具有宝贵文献价值的20卷本《徽州文化全书》的整体出版,以及徽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繁荣,都为徽学研究向纵深领域

^①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徽学研究资料辑刊》《徽州文书》和《海外徽学研究丛书》等系列成果的基础上,此次隆重推出《徽学文库》,显示出了该研究机构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远的学术见识。

本次推出的《徽学文库》,精选近年来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丛书既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结项成果,也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最终鉴定结项成果,还有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它为祖国大陆的徽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必要的补充。这些成果内容涵盖了徽学理论探讨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成果、徽学专题研究,以及徽州文化遗存调查、保护与研究。因此,无论是就选题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作者队伍的结构与层次,还是就成果的质量及水平而言,本丛书都堪称目前徽学研究前沿领域的精品,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徽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徽学是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和一块专门的研究领域,徽学所研究的徽州整体历史文化既是区域历史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有机结合。徽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关系徽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直接涉及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理论和范式的创新问题,是徽学融入全球化视野,与国际接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和构建徽学学科平台的重要基石。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徽学文库》的出版,徽学一定会在整体史和区域史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徽学的学科建设也势必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是为序。

卞利

2016年3月10日于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喜读一部徽州人口史专著

中生要我给他的《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写序,我愉快地答应了。他参加我主编的《清代宗族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徽州清代宗族资料。我早就读过他对徽州下层社会非常态婚姻、族内民事纠纷的解决、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徽州族会与宗族建设、徽州收族理念的转变、徽州民间钱会等专题论文。他是徽学研究专家。如今有新著,为他高兴,于是欣然命笔。

专著开篇回顾学术界对包括徽州人口史在内的人口史研究状况,指出“对生存压力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人口研究的传统”,“人口研究始终渗透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和问题意识”。诚然,“强烈的生存意识”,是人口史、徽州人口史研究者的关注点;“问题意识”,中生指的是关注人口史研究中的得与失,特别是有哪些不足,需要提出什么样的新课题、新研究方向,以便将研究推向新的境界、新的高度。中生强调“问题意识”,正反映了他自身对徽州人口史研究的高标准追求。对此,欣慰之感和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问题意识”,在中生的书中,表现为对徽州人口史进行整体性观照,力图对徽州人口与社会作出全方位的、立体的研讨和说明。他说:“人口史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仅仅是作纯粹人口学意义上的探讨。因此必然要与制度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也必然要在特定的

时空下,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微观和宏观的结合。这样就更容易把握人口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深入人口史和社会史研究。徽州人口在群体性、身份性和重合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由于人口在人的不同的生命阶段往往具有不同的身份,人口分流是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徽州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徽州人口分流应放在徽州的整体社会的框架内进行探讨,社会学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中生讲的“整体性观照”,我理解有两个意思,一是对徽州人口史进行“人口与社会”整体性讨论,这很符合历史学界“整体史”研究的愿景,因此我想中生的徽州人口史研讨,在一个不大的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二是将徽州人口分流放在徽州整体社会框架内进行。关注徽州人口分流,应当说抓住了徽州人口史的主要问题,这是完成论题目标的关键所在。

“徽州人口分流”顺理成章地成为这部专著的着力所在,即在严重的生存压力下,人口向三方面分流:改变传统的农本观念,变更职业,由务农而经商,形成强势的徽商群体;以身份换取生存权利,从良人地位的农民,卖身或入赘婢女为奴,下降为依然务农的世仆贱民;为更好发挥谋生的主动性和获取某种生存保障,大家庭分化为小家庭,同时组合成大宗族。讲述徽州人口分流史,无异于道出徽州的历史特点——一度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引起皇帝瞩目与同情的世仆命运,强化建设的徽州宗族,从而有意无意间勾勒出徽州社会简图。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大量徽州契约文书资料的运用。研治地方史,方志无疑应是首选参考资料,有关的政书、文集、笔记亦为不可缺少的史源,幸运的是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存世,给予中生索取资源的可能,他不辜负天然的有利条件,利用它进行论证,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道贺的话就说到这里,期盼中生学术新著赓续面世。

冯尔康

2014年11月5日

写于安徽大学鹅池之畔

目 录

MULU

导 论	1
第一章 明清徽州的人口与环境	20
第一节 从丝绢纷争说起	20
第二节 脆弱的生态环境	26
第三节 扩张的人文环境	40
第四节 人口的增长、集中与贫困	57
第五节 小结	68
第二章 儒贾并重:徽州人口的职业分流	71
第一节 贡赋性商品经济与徽商的兴起	71
第二节 职业观的转变	85
第三节 儒贾并重的职业选择	104
第四节 小结	128
第三章 婚姻与买卖:徽州人口向下层的分流	132
第一节 性别失衡与非常态婚姻	132

第二节 卖身、婚配与生存	158
第三节 小结	181
第四章 分家与迁徙:由血缘到地缘的人口分流	183
第一节 分家	183
第二节 迁徙、出赘与出继:对《新安第一家谱》的分析	210
第三节 小结	226
第五章 徽州的生存伦理与宗族社会	231
第一节 人口分流与生存伦理	235
第二节 荣耀与耻辱:明清徽州家族对女性的控制	255
第三节 家族教化体系与明清徽州社会	278
第四节 流失与归老:内向化的徽州	301
第五节 小结	323
结 语	326
参考文献	333
后 记	351

导 论

一、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缘起

对生存压力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人口研究的传统,外国如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国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都是如此。人口研究始终渗透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和问题意识。这种传统和意识也被人口史研究所借鉴。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缺乏精确的人口统计,人口统计与土地统计一样主要是为了赋役。对人口与赋役的研究,肇始于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①,其主要贡献是在人口统计数据上,并结合了赋役制度方面的探讨,但由于书中数字主要取于官修史书,因此也难以进行放心的引用。何炳棣的《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②则着重于从制度和经济方面研究明清人口。尤其是对“丁”所做的科学阐释和对影响人口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强调,对后来者极具启发性。他对中国历史人口的宏观把握和深度理解,已经将中国人口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何炳棣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国内学者,掀起修补和重建人口数据的高潮。曹树基试图在时空结构下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 [美]何炳棣:《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重建明清时期各府的人口数据,同时寻找关于社会变化的新解释^①。但是笔者认为,地方史研究者还无法直接从该书中获得所需的数据^②。

曹树基推测清代徽州人口年均增长 3‰,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的 247.5 万为基数上溯,得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为 216.9 万^③,1851 年约为 271.5 万;太平天国运动后徽州府人口约损失 163 万,约为人口总数的 60%左右,而其中的 70%死于瘟疫;生存者中约 35%外出,常住人口约为 71 万^④。徽州、江西与江南作为流动的商业性社会,“人们对于生育的控制是具有相当理性的”,“商业区域预防性人口控制的社会经济背景大体与现代西方相似”^⑤。避孕、流产等婚内节育方式的使用,使商业区域人口总是呈低增长态势,而且不受内部资源的影响;外在性压力对人口行为的作用也不明显,人口比较稳定,不因年成或粮价而波动,溺婴的现象也比农业区域少得多。而农业区域集体性的人口行为则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状态^⑥。由于作者缺乏相关论述,因此实际上徽州是否与这种划分相符,非常令人怀疑。

与曹树基沿袭官方数字将明初徽州人口数确定为较低的 59 万多不同,叶显恩分析了徽州人口的密度,估计明代徽州人口在极盛时达到 120 万左右,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徽州人口应在 200 万左右,人口的隐漏和外流是造

①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页。

②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 页。

③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01 页。

④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99—500 页。作者对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人口所造成的损失前后估计不一致,在该卷最后一章的第 871 页,作者又将这种损失上升到 80%。

⑤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71—872 页。

⑥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83—884 页。

成在籍人口统计数据严重偏低的原因^①。卞利则从制度层面探讨人口问题,指出明清两代户籍法的调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有利于赋役征收和社会稳定^②。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是一个人口高度增长的社会,但从各种人口数据中难以窥见这种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展开对徽州人口密度分布和村庄的探讨,唐力行和美国学者凯瑟·海泽顿以“都”为单位考察村庄的演变,并据此把徽州人口密度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认为人口密度的增加经历了从核心地带向过渡环状带和边缘环状带呈放射状发展的过程。此外,他们认为商人资金回流是徽州村庄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而且人口密度的分布格局与名族密度的分布格局基本上是一致的^③。徽州族谱多,学者们根据族谱可以复原一部分有效的人口数据,并能在更微观的范围内探讨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从人口的视角探讨徽州的宗族和商人等社会经济和文化,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独特且必要。

商人是徽州人口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对商人的研究开始得最早,早先如傅衣凌和日本的藤井宏^④,后继者众多,如叶显恩、张海鹏、唐力行、王振忠、卞利等。徽商的兴起与衰落、徽商的规模与经营、徽商的特色与影响等,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叶显恩着重从封建性方面探讨了徽商,如徽商的缙绅化、徽商资本的封建化等^⑤。《徽商研究》是从经济方面研究徽商的代表性作品。《徽商研究》指出,徽商中有出自阀阅之家者,但更多的是生计困难

①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41页。

② 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唐力行、[美]凯瑟·海泽顿:《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④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东洋学报》1953、1954年,译文见《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9、10期;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⑤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的小商小贩^①。阀阅之家为何经商？它与小商小贩之间是否有关系呢？徽商的兴起必然伴随着职业观的转变。陈其南认为，职业观的转变受到了家族伦理的深刻影响，徽州商人经历了弃儒从贾、贾服儒行和由贾入儒的循环发展过程^②。陈其南注意到了商人和家族的结合。唐力行对徽商与家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徽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比较有影响观点，如徽商的兴起、发展与强盛都离不开徽州宗族，徽州文化的特质是商人文化，徽州社会内部盛行着小家庭—大宗族结构，等等^③。王振忠对徽州民俗文化着力很大，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关注徽商在外地的活动和影响，其中关于徽商的社会流动和土著化进程的研究，有助于对徽州人口迁徙的研究和大徽州的探讨^④。王世华也探讨了徽商对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指出徽商是长三角地区兴起的重要力量^⑤。在对徽商的探讨中，学者们也关注到了徽州的婚姻和女性，如早婚和“两头大”的婚姻方式以及徽商妻子的艰难人生，等等^⑥。在政府对商人的管理上，卜永坚认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在两淮盐政制度中形成了纲法组织，纲法是里甲制在商业上的实践，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操作上，都和定期编审户口、制定徭役的里甲制毫无区别，可以说是商业里甲制^⑦。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② 陈其南：《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家族主义》，载《江淮论坛》，1992年第2期。

③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⑤ 王世华：《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载《学术界》，2005年第5期。

⑥ 唐力行、王振忠的著作都对此有所研究。另参见王磊：《徽州朝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高寿仙：《徽州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 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之“纲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宗族社会中,宗族人口的探讨需要引起关注。对于宗族的研究^①,早先主要着眼于它的封建性,即强调族权与政权的一致性,以及对族人的封建统治。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是如此,以叶显恩和赵华富为代表。叶显恩在《明清徽州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中对徽州宗族有比较集中的探讨。赵华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个案研究和调查为基础,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探讨了徽州宗族的繁荣、徽州宗族的基本特征、族规家法和宗族统治的强化等方面^②。但是在族权和政权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宗族的组织化建设上,有着较强的国家色彩^③,国家对人口的控制需要宗族,而人口也利用宗族来保护自己,防范来自国家权力方面如赋役征派中的弊端,缓解来自社会中其他方面如人口和生计压力所引起的危机。唐力行对徽州宗族进行了全景式的探讨,更强调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④。利用宗族来研究人口,族谱资料是关键,族谱中有比较集中和相对可靠的人口资料,包括生育、死亡、婚姻、迁徙、家庭结构和家族功能等,还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信息^⑤。与试图重建数据的人口学者轻视谱牒不同^⑥,李中清等人着眼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构建了一套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发展体系,他们非常重视谱牒中丰富的死亡、婚姻、生育和收养

① 常建华对宗族史研究做了非常细致的回顾与比较深刻的反思,参见其论文《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赵华富:《两驿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常建华关于族正和族规的研究证实了这种互动关系。常建华:《清代族正制度考论》,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常建华:《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载《学术界》,1990年第2期;常建华:《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见《明清人口婚姻家庭史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④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 刘翠溶的《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⑥ 曹树基虽然利用族谱人口数据,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少量的微观人口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符合他的宏观人口数据,因而他对族谱资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见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77—881页。